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PRING VOLUME, FEB. , 15 1995

中國社會
科學輯刊

春季卷

一九九五年二月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PRING VOLUME, FEB. , 15 1995

中國社會
科學輯刊

春季卷

一九九五年二月

实行符合国际学术期刊惯例的正规匿名审稿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本刊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建设,其间当包括在办刊编辑中尝试确立以学术价值为唯一依归的、合乎国际学术期刊惯例的正规匿名审稿制度。实行此一制度,旨在使学术研究尽可能地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使学术论文的评审取舍尽可能地以学术质量为标准而公允地展开,以确保本刊的学术品位和质量,实现本刊“以学术为本”、“提升中国社会科学、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宗旨。本刊真诚地欢迎广大作者、读者与我们编者一起共同从事此一学术制度和规范的建设,进而使中国社会科学以其学术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展现于世界学坛。

评审规则

一、本评审规则适用于投赐本刊的所有文稿,而不适用于本刊编委会的专门约稿。

二、本刊主编负责初审投赐的全部文稿。经主编初审认可的文稿方可进入评审程序。未获初审认可的文稿自稿件收到日起三个月内通知作者。

三、文稿经主编初审认可后即进入正式评审程序。评审工作按双向匿名方式进行;在贯彻回避原则的前提下,每篇论文至少由两位学术编委评审,亦可由主编聘请学术编委会以外的学术专家或知名学者进行评审。

四、负责评审稿件的编委或学者严格根据论文的学术质量提出书面评审报告,并依据①可考虑采用、②须经修改,再作评审、③不适宜采用的分类提出意见。评审报告的内容于六个月内通知作者。

五、稿件最终采用与否由主编根据评审报告、本刊学术论题总体安排情况以及本刊宗旨作最后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学术编委会

為
了
中
國

王
鐵
崖

一九五
九

（王鐵崖：著名國際法學家・北京大學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一九九五年春季卷

目 录

主题研讨:中国与亚洲地区安全

编者按语

- 5 阎学通 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
11 王飞凌 冷战以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简析
23 胡伟星 冷战后的亚太安全与台湾问题

学术专论

- 39 翟林瑜 从代理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50 盛 洪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
57 李培林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
67 黄小明 世界事务中人类实践的板块现象及其哲学意义
81 郝雨凡 腐败与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
92 王岳川 无回应的传媒与心性交流的中断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对话单维化透视

主编 EDITOR-IN-CHIEF

邓正来

辑刊监制人 DIRECTOR

徐泽荣

学术编辑委员会

ACADEMIC EDITORIAL BOARD

林毅夫 王 焱 阎步克 孙立平 樊 纲 王沪宁 宋新宁
张晓劲 景跃进 杨念群 陈锡文 梁治平 崔之元 刘 东
王缉思 季卫东 尹兰天 高 毅 杨 沐 钱乘旦 黄 平
时宪民 郑也夫 许纪霖 张 静 陈 来 何光沪 盛 洪
汪 晖 陈嘉明 史天健 朱 英 于 硕 刘小枫 陈弘毅
童世骏 李 强 黄小明

助理学术编辑委员会

ASSISTANT ACADEMIC EDITORIAL BOARD

程 农 李传敢 丁小宣 张 卫 任 晓
时和兴 晓 欣 罗金义 周 勇 宋 军

海外编委会

OVERSEAS CORRESPONDENCE BOARD

J. Habermas(德) A. Giddens(英)
J. Alexander(美) S. N. Eisenstadt(以)
G. Johnson(美) L. Sklair(英)
H. Alker(美) A. Dirlik(美)
G. Therborn(瑞典) P. Van Ness(澳)
G. Skirbekk(挪) T. McCarthy(美)
A. Touraine(法) R. Blackburn(英)
E. Shils(美)

顾问委员会

ADVISORY BOARD

张芝联 吴敬琏 赵宝煦 端木正
张仲礼 汤一介 关信基 楚 庄

主题研讨

中国与亚洲地区安全

编者按语

1994年整个世界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颇为动荡的一年,从非洲大陆到波黑,从朝鲜半岛到海地,地区冲突和危机遍及全球。东亚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相对最稳定的地区之一,尽管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和美国直升机事件被国际传媒炒得纷纷扬扬,但并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发展为热战。中国经济继续持续高速度发展,使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引人注目,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也就成为人们继续予以关注的重心之一。近年来,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不少学者探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中心主题。但是实践告诉人们,安全问题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依旧是不容忽视,甚至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亚洲一直不存在欧洲那样的安全机制,冷战后亚洲的安全问题将会出现何种国际安排,作为亚洲主要大国的中国其中的作用如何,是国际学术界近来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

本期主题研究开辟的《中国与亚洲地区安全》议题,发表了阎学通、王飞凌和胡伟星三位先生关于后冷战时代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论文。阎学通先生从总体上讨论了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并将其概括为“积极防御战略”,其辅助手段是“集体安全”和“睦邻政策”。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民族分离主义和边界纠纷;二是次区域安全问题,即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半岛核扩散问题。

王、胡二位先生主要分析了两个案例,即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和台湾问题的政策。这是当下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两大问题。王先生对当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政策的四种解释进行了分析,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情报信息的可获得性、地缘政治和均势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个人看法,并将中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中的立场,作为其“维持现状:‘有中国特色的’均势战略”的有力佐证。胡伟星先生对台湾问题的讨论是建立在大量可靠数据资料的基础上的。该文指出,中国政府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上的最重要手段是和谈,但是如果和谈不成,大陆在什么条件下会对台使用武力呢?台湾海峡一旦爆发武装冲突,将会产生何种地区和国际效应呢?国际社会将作出何种反应呢?胡先生对此做出了较为学理的分析。

这三篇论文探讨的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证研究色彩。他们三位都曾在美国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学,王、胡二先生仍在美国任教。他们的论文阐发的是其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代表本刊编委会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即他们都没有就事论事。阎先生将安全与环境、利益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王先生关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比;胡先生对相互依赖、一体化等理论的运用等等,都是有意义的。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在中国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领域,本刊编委会拟透过此类的研讨来作为一个起端,使海内外学者有更多学术切磋的机会,对该学科的发展作出努力。

- 102 高 柏 现代日本工业政策的三个范式及其形成的制度性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研究基金论文

- 112 朱苏力 跨文化研究中的“社会控制”

海外论坛

- 135 德里克(美) 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 142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美) 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五个论题:
以巴西经验为实例

批评·回应

- 148 赵 林 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兼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学术动态

- 164 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学术讨论会辑要

- 166 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辑要

- 166 罗荣渠 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

- 182 小林多加士(日) 东亚: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匿名评审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注释体例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学术基金实施章程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译丛·文丛)编辑出版计划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编委会

电话 Tel 2570033—3175

出版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电话 Tel 7218694 7218094

(京)新登字 007 号

书号 ISBN 7—108—00765—7/C·29

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承印 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奥本公司

本刊版权保留,如欲转载、翻译或收辑本刊文字,
必须先获本刊书面许可。

All rights reserved. Permission by writing must be obtained for reproduction
or translation of texts appearing in this Quarterly.

定价 国内:¥15.00, 海外:US\$10

主题研讨

中国与亚洲地区安全

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

○ 阎学通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唤起了海内外政治学家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兴趣。许多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尤为关心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政策,他们担心中国崛起后要填补冷战后东亚地区出现的力量真空,将打破该地区的平衡,从而出现地区安全失衡。这种担心主要源于对历史的记忆,美国崛起后发生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德国与日本崛起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苏联的崛起形成了美苏对抗的冷战。中国实力强大后是否也会采取与美、德、日、苏走向强盛时期相似的安全政策呢?历史有重复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只有研究了中国的具体情况才能进行判断。依据它国的历史简单地推断中国安全政策难免要被历史否定。

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不仅受其实力消长的影响,而且受到其特有的安全环境、国家利益以及政治文化的约束。1994年出版的美、日、欧三边委员会报告认为,“应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个机会而不应是威胁。”^①这种观点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中国所面临的冷战后特殊环境、其所追求的独特国家利益和其传统的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中国所制定的东亚安全政策内容及其原因。

环境、利益、文化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状况大为改善,直接军事威胁消失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外部的军事威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先后遭受了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威胁。冷战后情况大变,有入侵中国军事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俄国,但这两个军事强国都无军事入侵中国的意图。俄国忙于稳定混乱的内政和经济危机,无意向亚洲扩展势力范围。美国的相对衰落已使孤立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国内反对美国军事卷入外部冲突的呼声日高。由于美俄不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世界上就无其它外部军事力量可以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从而中国得到了鸦片战争以来不曾有过的安全环境。

中国的安全环境总体上讲是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安全没有问题。比较突出的两个安全问题是民族分离主义和边界纠纷。冷战后,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的分离主义分子有很大影响,台湾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明显加剧。尤其是台湾,新领导层巩固了他们取代老一代国民党人的统治之后,加紧了“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1993年台湾公开提出出现阶段的所谓“务实外交”政策。此后,李登辉以度假为名访问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不久走访

拉美国家，要求他们在1994年第49届联大重提关于台湾的会籍问题；1994年9月他坚持要出席广岛亚运会。台独活动不仅会威胁中国的统一，而且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提供了借口，形成多米诺效应。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较多的边界分歧。在东亚，中国与俄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越南仍未能就边界划分达成最后的协议。尤其是南海地区的南沙群岛海域，领海纷争复杂。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分歧内容不同，而且边界与石油开发问题掺和在一起。不同跨国公司与不同国家签订的石油开发合同有区域重叠的矛盾。其中美国公司卷入的最多。

随着安全环境的改善，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心也变化了。冷战时期，中国安全利益的重点是军事安全与生存安全，军队主要任务是保证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遭到侵略时，军队要把侵略者消灭或赶出中国。冷战后，外部入侵之虞没有了，中国安全利益的重点从军事安全转向经济安全。国防任务是防止侵略战争对中国经济建设造成破坏，也就是说要建立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

中国经济安全利益有三个方面：一是避免战争发生。从近现代史看，西方的战胜国无不通过战争获得经济好处。与西方不同，无论中国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鸦片战争以来的每次战争中国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能让战争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为了争取时间，中国要尽力避免卷入新的战争。

二是将可能发生的战争限制在边境之外。如果战争发生，中国必须防止战火蔓延到本土上来，否则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将付之一炬。中国经济重镇集中于沿海地区，不要说战争殃及全国，只要破坏了沿海经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就会遥遥无期。建设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能力是现实的需要。

三是保护海洋经济权益。中国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日益广泛，这不可避免会发生海洋经济权益的矛盾。中国只有拥有足够的海洋安全保障能力，才能做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海上走私、海盗已对中国的关税收入、海上养殖、捕鱼及海上运输构成威胁。中国工业对海外原料和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需要保护远洋运输线的安全。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安全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西方殖民者都是以武力征服殖民地，然后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经济上掠夺殖民地。中国的封建王朝则不同，他们只与属国建立一种从属关系，提供军事保护，却没有任何经济要求。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其舰队规模足以吞并所到之处，但他非但没有去征服殖民地，反而是向当地人传播中国文明，送给他们工具、种子、书籍、用具等。至今在东南亚一带有许多郑和庙纪念他的功德。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侵略性，不愿以武力扩张自己的领土。

中国不主张以武力攫取利益。美国政治学家乔纳森·阿德尔曼研究了1840—1980年中国卷入的十一场战争和军事冲突。他发现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矛盾和冲突的目的与西方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对中国来讲“战争主要不是获得领土，击败敌人或是取得权力。即使战争用于威慑敌人，威慑效果也难于解释战争的动机。战争主要是用于表示决心，使敌人难看、惩罚或是自卫——完全是传统的中国观念。”^②笔者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点出了中国使用武力的非功利主义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行安全政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武装的目的在于自卫而不是扩张。中国武术号称天下第一，民间习武是传统。与武术技艺同时发展起来了武德，即习武之人以不欺凌弱小为美德，以健体防身为根本，武林高手既要武艺出众又要武德高尚。这种武力止于自卫，不以寻求利益观念对中国军界、政界都有极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国防力量完全是以自卫为目的的。中国不在外设立军事基地，中国反对过多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国际维和，中国也很少派兵参加维和的军事行动。中国派兵参加的唯一一次维和行动是在柬埔寨，派遣的仅是工程兵。在中印边界反击战和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却主动单

方面撤军，而没占领已控制的对方领土。

第二个重要文化影响是使用武力的道德规范。中国在作是否使用武力的决定时受到道德规范的限制，而不是完全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注重使用武力的正义性，认为只有正义之师才能得到全社会的道义支持，也才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为了获得道义上的有理地位，中国总是到了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使用武力，主动使用武力解决纷争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是极个别的现象，而被动使用武力则是极为普遍的。将武力统一台湾限定在外部入侵和台湾独立的情况下就是个典型例子。

安全战略

冷战后中国不再面临直接的军事威胁，保护经济发展成为主要的安全利益，继续坚持自卫为国防宗旨的思想，中国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这一安全战略是对诱敌深入、分别消灭战略的否定。要保证已有经济建设成果不受战争的摧毁就不能让战火蔓延到国土上，军队就必须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己任。积极防御战略的核心就是避免战争的发生和御敌于国门之外以求自卫。

积极防御战略的政策取向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强军事能力。军事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威慑对方不敢对华发动军事进攻，一方面确保将战火阻挡在国门之外。二是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减少它国对华进行武装攻击的动机。正是这种政策取向促使中国采取了国防现代化、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和加强睦邻友好关系三结合的安全政策。

国防现代化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基石。目前中国军队的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中国海军没有航空母舰，远洋作战能力十分有限。日本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海军装备还不如日本。中国空军的主战飞机歼—8仅相当于美国的F—104、俄国的米格—23和法国的幻影—Ⅲ型战斗机，无法与美国F—16、俄国苏—27和法国幻影2000对抗。中国的主战坦克T—85是80年代的产品，缺少现代电子设备装置。这种军事水平上的差距显然无法有效地保证积极防御战略的实施。为此，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作为既定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解放军“要加强军备，提高国防能力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顺利进行，要完成保卫国家利益、领土、领海和领空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神圣使命”。^③

由于经济实力不足，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维持在一个适中的速度。经济发展被中国领导人看作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直接军事威胁的消失更坚定了这一政策。中国领导人多次要求军队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整体的国家利益。邓小平对军事将领们讲“四个现代化要有个先后，国民经济建立起较好的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军事现代化。”^④中国的国防开支从帐面上看，其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相似。1993年前者增长13%，后者增长了13.4%。但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国防开支增长就大大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按1988年的购买力计算的，而军费增长则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2%。这就是说中国国防开支的购买力比1992年还低了9个百分点。

为了弥补军事现代化水平低的缺陷，中国支持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早在50年代中国就曾与苏联共同倡议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放弃了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冷战后，在中国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威慑所有威胁力量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与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进行安全合作，以便对不负责任的军事力量加以约束。1993年1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建立亚太国家安全与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明确表示支持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在1994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首届会议上提出了五点建议。建议的核心是和平解决纠纷，不搞军备竞赛和核扩散，促进安全对话。^⑤为了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中国不断加强与他们的军方往来。199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访问了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总参谋长张万年访问了马来西亚。同期接待了俄罗斯总参谋长、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司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老挝国防部长等。此外，中国还接待了美国国防部

副部长和美太平洋总部司令。

中国集体安全的政策强调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原则，但合作的重点对象仍是美国和俄国。东亚国家间政治制度 and 经济水平的差异很大，一个单一的安全合作方式难于被大家都接受，此外该地区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也十分复杂，解决分歧的方式无法拘于一格，因此中国主张双边与多边的安全对话都应进行。不过该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仍是中、美、俄三方，只要这三方之间能进行军事合作，东亚地区的安全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如果美、俄不支持东亚的国家和政治地区破坏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国现有的军事力量是可以维持自己东亚边界的安全的。冷战后，中俄军事关系明显发展，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也不断恢复。1994年9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决定进行多方面的安全合作，并发表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⑩1994年中国派副总参谋长访问美国，就恢复中美之间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论。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华，预示着中美之间军事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鉴于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所以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不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在禁毒、反走私、打击海盗、禁止非法武器交易、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都开展了积极合作。中国与东亚国家签有多种不同的这方面协议。

配合集体安全政策，中国还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以增加和平解决纠纷的条件和减少武装冲突的可能。发展睦邻友好政策始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90年代起中国将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是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努力建设和平环境。”^⑪中国睦邻友好政策与冷战时期的同志加兄弟的外交关系的最大不同是强调发展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无论意识形态是否相同，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友好关系只能是平等和互惠的。

为了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这一建议由邓小平1984年所设想，^⑫冷战后成为中国解决世界纠纷的主导思想，多次在中共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得到重申。中国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已经得到一部分东亚国家的积极反应。中国与南海周边的国家已经组织了专家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共同开发海底资源；中国与日本关于东海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基本搁置；中国与俄国边界的95%以上的问题都已解决，东端剩下的一两处争端也在进行谈判。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平缓了边境的紧张状况，中国可以大大减少边境驻军的经济负担，可以集中有限的军费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次区域安全政策

目前东亚地区并无整体性的区域集体安全组织，中国在该地区的具体安全问题基本上还得在次区域的范围内以双边或多边的方式加以解决。在东南亚中国主要面临台湾问题和南沙问题，在东北亚面临朝鲜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问题和俄国的沙文主义问题。

外部势力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是引发台湾海峡地区战争的主要危险。台湾与中国大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已生活了45年，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政治认同一直就没有，现在文化认同又严重的减弱，以致台独势力不断发展，但这些条件并不能使台湾真正从中国分离出去。台湾要分离出去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其中包括足够的军事防御能力。正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所以台湾当局虽然紧锣密鼓地拓展国际空间却不敢轻易宣布独立。然而外部的军事支持却有可能增强台湾当局对自身军事能力的信心，从而冒险宣布独立，将大陆逼到死角而不得不用武力维持民族统一。自1991年美国开始向台出售F-16战斗机以来，对台军售不断加码。美对台出租了诺克级巡洋舰三艘，新港级战车登陆舰三艘，出售大批舰载导弹和一套MK-45舰用大炮系统，售台80套电子设备装配F-16战斗机。^⑬美国对台湾持续军售必然使台湾认为美国会军事卷入可能的台湾海峡战争，这将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现状。

中国大陆的对台统一政策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承诺放弃武力”。由于经济建设对和平

环境的依赖,大陆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1994年的对台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以经促政的和平统一策略,即通过发展两岸经济关系促进政治统一的实现。面对海峡两岸长期分裂的现实,大陆提出一国两制的建议,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行各自不同的政治统治,台湾可以作为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法律、政治制度,政府及军队,但两岸在国际社会上要以一个中国的声音讲话。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即没有种族歧视和信仰歧视,只要认同中华文化四海之内皆兄弟。由于一国两制的倡议还未被台湾接受,大陆对以经促政的统一策略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大陆保留武力统一的权力,不过使用武力限定在台湾独立和外部入侵的条件下。从目前看,外部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较小,而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项政策显然主要针对台独而言。

南沙群岛问题复杂,中国反对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倡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沙群岛地区的领海争议复杂性不仅在于涉及的有关国家很多,而且每个具体区域的分歧的内容也不同。有的是海岸线划分依据问题,有的是领海距离问题,有的是海洋经济区的范围问题,有些地区是双边纷争,有些区域则是多边纷争,希望通过一揽子计划解决该地区的分界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认为应就具体的区域通过有关国家和平协商解决。中国认为南沙问题可以在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但不同意设立东盟和中国磋商安全问题的专门机构。^⑩为了创造和平解决纷争的气氛,中国认为在东盟地区论坛这种集体安全对话会上讨论这一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解决具体问题需要有关国家的最终同意,中国与东盟并无任何矛盾,而且东盟也无法代替具体国家签署边界协议,所以中国不希望使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非中国解决南沙问题的最终方案,而是促进和平解决的一个步骤。就目前形势而言,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出现新的对抗。搁置争议是共同开发的前提,可是搁置了争议也不一定能进行共同开发,但只要搁置了争议(如中日在钓鱼岛上的默契)就可以避免军事冲突和对抗。在共同开发还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在南沙问题上更为注重搁置争议。为了使有关国家能真正做到搁置争议,中国建议有关国家在达成共同开发的协议之前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对于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国家,中国则认为是要继续争议并表示。

通过对话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区是中国东北亚安全政策的重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并不存在目标上的分歧,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区。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该地区的无核化。中国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区建立的关键在于美国与朝鲜的直接会谈。中国反对美国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或进行军事打击,主要是担心这样做会破坏东北亚的地区稳定。朝鲜是一个政治封闭型国家,政治变化的因素很不明朗,经济制裁有可能激发朝鲜与韩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发生,都必然严重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而且也会波及到华北地区。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华北是中国主要农产区和轻工基地,中国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殃及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国认为有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以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提供良好条件。朝鲜之所以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核查不给予充分的配合,重要原因之一是它觉得自己缺少核保护。当美国对它采取敌对立场时,朝鲜难以相信自己可以免遭美国的核打击。而如果美国承担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一方面解除了朝鲜的核担心,另一方面也使朝鲜失去了发展核武器的必要和理由。故此,中国多次敦促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责任。^⑪

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一直十分关注。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93年,执政几十年的自民党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新的联合政府很不稳定,执政后的一年里竟换了三任首相。由于政局不稳,日本社会要求一个强政府的呼声日高,这为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土壤。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否认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招致中国抗议,该人被迫辞职。不出三个月,村山内阁的国务大臣又因宣扬日本不是侵略亚洲国家而是造福于亚洲国家而辞职。中国对这种军国主义的论调十分警惕,并予以坚决的批评。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敦促日本政府稳

定国内政治，正视历史事实，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对于日本政府急于向海外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并不表示支持。

中国对俄国的日里诺夫斯基现象也很关注。冷战后，俄国未能从苏联继承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国际地位的衰落和国内经济的衰败引发了俄国人对政府的不满，随之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沙文主义思潮发展起来。这些沙文主义分子对中俄经贸关系不满，散布反华的言论。为了避免因俄国内政变化引发中俄之间的冲突，中国希望在国家与国家的平等基础上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合作关系。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时对俄国听众讲“两国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成为不对抗、不结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⑫为了确立这种关系，双方在《中俄联合声明》中表示承认对方的大国地位，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合作。^⑬

中国东亚安全政策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以建立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周边和平环境为目标，以国防现代化为基础，以集体安全和睦邻友好为辅助手段，实施积极防御战略的安全政策。在次区域地区，中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放弃武力的台湾政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和平对话、建立无核区的朝鲜半岛政策；以及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加强政治稳定的东北亚政策。

【注释】

① Yoichi Funabashi, Michel Oksenberg & Heinrich Weiss: *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4, p. 4.

② Jonathan R. Adelman, Chih—Yu Shih: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3, p. 238.

③《加快改革开放》（江泽民：《十四大报告》），《北京周报》1992年10月26—11月1日，页26。

④《邓小平文选》卷三，页128。

⑤《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7月20日。中国的五点建议是：①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新型国家关系。②以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为目标，建立平等互利、互相协作的经济关系。③以平等协调、和平解决为准则，处理亚太国家之间的争端和纠纷，逐步消除地区不稳定因素。④以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坚持军备只用于防御的原则，不搞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不搞核扩散，有核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支持建立无核区、和平区的主张。⑤以增进了解和信任为目的，促进多种形式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对话与磋商。

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9月5日。

⑦《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4月2日。

⑧《邓小平文选》卷三，页87—88。

⑨《中央日报》（国际版）1994年7月22日和9月16日，《世界日报》1994年8月20日。

⑩《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7月27日。

⑪《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7月26日。

⑫《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9月5日。

⑬同上。

阎学通：1952年12月出生，199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副教授。

冷战以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简析

○ 王飞凌

维持一个对中国有利、稳定而和平的现状看来是中国九十年代东亚安全政策的核心。中国欢迎冷战后的东亚现状是因为, 它已与该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良好关系。大多数旧的安全威胁已经消逝, 新的挑战还没有造成重大的问题。经济利益已取代政治影响成为中国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动机。同时, 中国警惕地注视着可能威胁到其国内政治稳定和祖国统一的安全隐患。中国似乎是在东亚致力于实行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均势 (balance of power) 战略, 目的在于防止美国在东亚建立其主宰地位或日本军事政治力量的复兴。北京显然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会构成对中国安全新的重大威胁。

为了进一步阐述上述基本看法, 本文首先将简介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的背景并勾画中国在冷战后对这一地区的安全目标, 以及其实现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然后本文将较详细地分析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行为以期印证我们对东亚安全政策的基本判断。这一分析也许将有助于观察家们去理解一个经济上迅速发展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中国的对外政策。

背景

东亚, 尤其是东北亚 (日本、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及蒙古) 一直都对中国的安全性命攸关。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 包括两大非汉族王朝 (元、清) 的建立均与来自这一地区的入侵有关。上个世纪中, 中国的安全遭到来自这一地区的多次威胁。首先沙皇俄国从满清政府手中夺走大片中国领土, 然后日本帝国多次击败中国人以至几乎灭亡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 北京就派遣了“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0 年—1953 年) 以期遏止一场美国支持的入侵, 其结果是中美成了二十多年的死敌。这一状况决定了这期间中国整个的安全防务政策。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前苏联成为中国的头号威胁, 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中苏多次发生边境流血冲突。到了九十年代, 中国周边显得平安无事, 但在朝鲜半岛上, 两支可观的军队依然对峙。新近发生的朝鲜核问题及其可能的升级, 使中国面临新的安全问题。

* 本文的英文原稿系根据作者 Northeast Asia in a Changing World 一书中的一章所改写。该书即将在美国出版。在译成中文时, 作者作了进一步的增删修改。作者在此特向 John W. Garver 博士、邓正来先生、常欣欣编辑和张妍女士表示感谢。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口中心均处于东亚，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更增加了东亚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到1992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占其外贸的2/3以上，^①与这一地区的贸易增长速度高达23%（1991），远远高于平均增长速度（17.6%）。^②日本现在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资金技术来源。中韩自1992年建交后，贸易额剧增56%，^③汉城已预测到，在2000年，中国将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为第三大）。^④香港一直是对华投资的最大来源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往来持续快速增长，它现在已是大陆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中俄贸易现在已远远超过当年中苏“蜜月”时期的水平。中朝经济关系已由过去的“经济援助”为主转为大量的双边贸易。^⑤蒙古也在两年内把它与中国的贸易额由几乎是零速升为占其外贸的10%以上，同时其对俄经济依赖减少了一半。^⑥

维持现状：“有中国特色的”均势战略

与中国九十年代的通盘安全考虑相一致，冷战以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在于维持现状，即保持目前这种“自二次大战以来最为宽松的安全架构”。^⑦

冷战结束之后，甚至在苏联解体和俄国力量衰落之前，中国便开始重估它的国际安全环境。北京倾向于强调“重组”、“改革”以及“综合国力竞争”。多极世界中的“和平与发展”取代了“两霸争夺”成为中国外交官的中心话题。基于国内的需要，加上面临1989年后国际上的一些冷遇，中国政府明智地采取了低姿态外交方针，侧重于寻求经济利益。这种宽松的外交政策持续至今。中国的分析家们认为，一个新起的多极结构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⑧他们觉得目前的“中、日、俄、美和平共处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⑨中国正享有“建国以来最佳的外部环境”。^⑩一位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宣称，现在“是中国自1949年也许是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外部军事威胁”，所以“中国总体上对现在的安全环境是满意的”。^⑪东亚地区则是整个冷战后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作为中国在东亚外交的中心，中日关系现在正处在19世纪以来的最佳状态。因此，中国认为东亚地区是和平安全的，目前没有任何直接的安全威胁。无论中国在东亚的长远安全目标或外交企图是什么，北京显然认为时间对它有利。

两大安全顾虑

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目前的一大安全目标，一个安全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则是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⑫经济的迅速发展已被确认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军事与外交目标因此需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恰如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所号召的那样：“军队必须明确地服从全国经济发展的通盘需要”。^⑬东亚地区本身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威胁有限，但外来大国的影响是需加注意的。历史表明，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政治斗争都与外来影响直接有关。^⑭

自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是中国的另一大安全顾虑。统一祖国是中国人的重大历史使命，直接关系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巩固。在这一问题上，北京一直对外来干预十分敏感。因为外来干预被认为会助长台湾的独立倾向。对北京来说，整个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外来干预即日本侵略的结果。^⑮如无外来干预，中国的统一或许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受外来支持的台湾独立将会“迫使”北京去使用武力从而导致代价昂贵的军事冲突，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钱其琛外长告诉美国纽约听众，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⑯这个问题所以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也就不奇怪了。

用均势战略来对付潜在威胁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一直关注着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以防任何可能打破现状的情况。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现状来看，美国和日本是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竞争者，能够对中国造成

新的安全麻烦。在东亚，中国担心的安全隐患因此主要有二：一是一个主宰局面的美国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二是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政治大国”日本。^⑭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会觉得东亚听从美国或日本是十分危险的事；另一方面，北京深深地担心一个主宰的美国或一个强大的日本会给台独以强有力的支持，阻碍中国的统一从而直接危及中国的主权，一些解放军的战略研究人员认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是对亚太地区安全的长期威胁”并对中国的安全提出新的挑战。而“竞争中的美国和日本”则是这些暗指的“超级大国”或“地区性超级大国”。^⑮虽然日本现在是一个很友好的邻邦而美国被认为基本上是个在东亚“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仍然清晰可辨地致力于一个微妙的“以夷制夷”的均势战略以求应付这些潜在的安全威胁。

中国对日本军事力量复兴的担心是路人皆知的。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安全目标之一。^⑯中国舆论界一直对日本军事力量复活的任何迹象都高度重视。《人民日报》每年八月都要报道和抨击日本东京靖国神社里的“闹剧”。^⑰台湾问题一直给中日关系带来麻烦。北京对日台的“官方接触”的强烈反应正说明了中国对外来干预中国统一问题的担忧之深。^⑱一家与军方关系密切的杂志于1994年夏天宣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已不再仅仅是一支自卫力量了，日本正在试探国际社会以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⑲很明显，中国军方对日本在冷战后东亚的意图和日本自卫队的能力抱有深深的戒心。

为了保持有利的东亚国际现状，必须防止日本军事力量的复兴。除了努力去建立自身的经济、军事力量以及实行一个“睦邻政策”外，^⑳更重要的是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压抑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和政治领导权的欲望。从非常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为了满足日本自身安全的需要而又不使日本军事力量增长太快，钱其琛外长于1993年3月公开说，原则上，中国不主张大国在外国驻军，但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问题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逐步解决。^㉑尽管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撤军言论，中国相信“中短期内”美军将会在东亚驻扎下去。日美安全条约将至少存在至21世纪从而制约日本的军事扩张。^㉒这样，美国在东亚成了“可利用”的稳定力量。

但中国也在用疑虑的眼光关注着美国在东亚进一步增强的影响。一个全力推进美式民主和人权的华盛顿完全可能成为对中共政权稳定性乃至对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国对台军售及其他令人恼火的举措一直在提醒中国，山姆大叔是中国统一计划的一大障碍。这些持续而长期的美国挑战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根本性制约。除了依靠自身力量之外，北京将会不断地寻求缓冲地带或抵消力量。^㉓北京舆论界就常把日本描绘成一个富裕但很“亚洲”的国家以用来抵消华盛顿人权外交的压力。

总之，北京的目标看来在于“防止任何大国主宰（东亚）地区”。^㉔为此，中国将在美日俄的矛盾中采取中立态度，因为这样有利于“中国去建立一个美日俄平衡机制”，进而使中国成为理想的“美日中或美俄中两个三角关系中的制衡者（balancer）”^㉕。

老问题大都有所缓解

到九十年代中期，大多数影响到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老问题已经解决或被搁置起来。由于俄方的许多让步，旷日持久的中俄边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莫斯科已同意中国拥有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小岛的主权。因此，问题解决了“百分之九十五”。^㉖中俄两国仿效不久前美俄两国所为，公开宣布今后将不把对方作为核武器目标国。双方还保证今后互不使用武力特别是不使用核武器。^㉗中俄新关系的直接结果是中蒙关系的更新，双方于1994年签订了一个新的友好合作条约。

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领土纠纷在1984年就在邓小平建议下“搁置”起来了。^㉘经济上持续不已的中日摩擦由于数目可观的日本经济援助常常能得到“适时的解决”。^㉙东京基本上一直在台湾问题上谨慎从事，至今尚能避免中日间为此而起的大的冲突。

朝鲜统一问题如无别因素卷入，对中国来说并无大患可言。如同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所观察的，中国在北朝鲜的影响由于苏联的崩溃而大大加强。这一局面导致朝鲜再战的可能性“几乎彻底消逝了”，^③因为意在维持现状的中国是不会去帮助北朝鲜用武力统一半岛的。

新的挑战

九十年代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首先，一个崭新的问题是怎样控制中俄之间的非法移民。近年来，许多中国人（报道说多达一百万以上）已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并非法定居下来。俄罗斯方面对此已有明显的反感。^④其滨海政府当局已颁布新的较为严格的管理中国在俄企业的规定。^⑤目前这一问题还太新，我们还无法就其对中国安全政策的影响作任何有意义的评估。

其次，北京需要应付日渐流行的在东亚组织经济贸易区和集体安全体制，包括建立东北亚无核区的建议、方案和设想。^⑥基于其维持现状的安全考虑，北京对此类设想一直持谨慎态度。民族主义精神影响下的中国不大相信集体安全之类的安排。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来，中国一直倾向于双边关系高于多边组织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中国担心一个东亚区域性组织会给美国或日本或两者一个机会去控制主宰东亚。更加扩展的美国影响或日本的“领队”角色对中国安全来说，如上文所述，不是帮助而是威胁。再者，一个东亚集体安全体系也许会阻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自由，包括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因此，除了马来西亚人提出的“东亚经济委员会”（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之类的区域性经济组织设想外，中国对有关东亚区域组织的设想一般是仅给予口头支持而已。中国过去两年里参加了有关亚太安全机制（APSM）的会议，但除了提出一些基本原则外，一直明确反对建立正式的APSM组织机构。^⑦中国对“东北亚无核区”建议的态度也是同样的谨慎与低调。中国官员据报道有兴趣探讨一个有限的东北亚无核区条约，但坚持美国只能作为一个“无投票权的顾问”参加谈判这一条约，因为美国作为一个非东亚国家，与这一无核区“无关”。^⑧

第三，西方、主要是美国，正积极在东亚推广政治民主和人权。这些很容易被认为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挑战从而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克林顿总统1994年5月26日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脱钩的决定也许会令中国感到华盛顿在人权问题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中国也许已经学会去利用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去消减华盛顿人权外交的威胁。美国有人提议以改变对台湾政策或对西藏政策来压中国。^⑨对此，中国是十分担忧的。^⑩除此之外，北京大概会警惕地把在亚洲的美式民主和人权十字军斗士们看作是一个持久的挑战而不是一个眼前直接的安全威胁。^⑪

第四，解放军的现代化，尤其是广泛传闻的中国远洋海军建设已招致东亚一些邻国及美国的不利反响，尽管这些反响也许是不必要的。中国的深海舰队建设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必要时（即台湾宣布独立时）去困扰台湾的海运；二是加强中国在南海诸岛争执中的地位。^⑫另一原因也许是中国沿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重要的海上运输需要更有力的远洋保护。^⑬解放军有限的军费（1992年—1993年的官方数字都是仅仅73亿美元），^⑭大概会严重约束中国海军的发展，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算，中国1992年的实际军费开支是216亿美元。^⑮即便如此，考虑到中国庞大的陆军和现代化海军装备的昂贵，北京也许要过许多年才能拥有一支真正的远洋舰队。

最后，中国面临一个棘手的朝鲜核问题，这个未完的争执成了九十年代中期东亚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和一些行为清楚地揭示了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在东亚的安全考虑。